

# 中土新创普贤信仰文献叙录

张子开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暨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普贤信仰在我国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乃至民间信仰中均占有重要地位, 而有关普贤文献向无清理。将有关汉文普贤文献区分为普贤类注疏、普贤类文物(普贤变)、中土普贤经、普贤类灵验记、碑文和寺院志等其他普贤文献共 5 类, 作详细解题, 纠正历来著录之误、辨识之讹和定名之不妥; 认为其中的《普贤菩萨说证明经》乃纯粹中土所造, 民间信仰色彩浓厚, 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研究价值。

**关键词:** 普贤菩萨; 佛教文献; 中国佛教; 注疏; 灵验记

**中图分类号:** I106.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0)06-0065-06

## Comments on the Literature about Samantabhadra Belief Newly Appeared in China

ZHANG Zikai

(Research Centre for Chinese Folk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Samantabhadra belief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Buddhism, Tibetan Buddhism and folk belief. But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Samantabhadra has never been sorted out. This paper classifies all the literature about Samantabhadra belief in Chinese character into five kinds: they are the commentaries on Samantabhadra, cultural or historical relics on Samantabhadra, Samantabhadra by China, miraculous stories on Samantabhadra, inscription and the temple notes. The paper also explains in detail the related issues, corrects the erroneous record of history, error of the identification, and wrong naming, and thinks *Pu Xian Pu Sa Shuo Zheng Ming Jing* made by China which has a strong folk flavor, important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research value.

**Key words**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Buddhist scriptures, Chinese Buddhism, commentaries on Samantabhadra, miraculous stories.

普贤(Samantabhadra)菩萨与文殊菩萨分别为我们所处娑婆现实世界化主释迦牟尼佛的左右胁士, 因其“大行”而被崇尚, 成为汉传佛教四大菩萨之一, 并以四川峨眉山为根本道场<sup>①</sup>。古来有关普贤的汉文文献, 包括译自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者、中土新制者两类; 前者笔者已另有叙述<sup>②</sup>, 后者中的敦煌遗书部分亦已有所涉及, 然意犹未尽, 故本文即就往昔未及之中土普贤信仰文献略作整理, 以就教于大方。

大致而言, 我国僧侣及其他信众所纂编的普贤文献, 包括注疏、普贤变(画像和雕塑)、灵验记、碑文和寺院志、新造普贤经 5 类。

① 有关普贤信仰的产生、普贤形象的演变、普贤菩萨在大乘和密教中的身份等, 请参考: 张子开《论普贤信仰的产生及大乘普贤形象的演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即出)、《普贤菩萨在大乘佛教中的定位及表征》(韩国《东亚人文学》第 13 辑, 2008 年 6 月 30 日出版, 第 269-299 页)、《普贤延命菩萨考》(《宗教学研究》2007 年 4 期, 第 92-98 页)等文。

② 有关汉译佛典中的普贤文献, 参考张子开《东亚新出现的普贤信仰文献叙录》, “古文献研究上的国际合作强化方案的摸索”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韩国忠州大学主办, 2010 年 6 月)。

收稿日期: 2010-09-20

作者简介: 张子开(1964-), 男, 四川绵阳人, 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禅宗文献研究方向博士,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佛教语言文学。

## 一、普贤类注疏

汉地产生的普贤类注疏,主要是汉密一派之僧人所撰。如:

### 1 《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十卷

又名《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华严经行愿品疏》、《华严经疏》、《贞元华严经疏》、《贞元疏》、《普贤行愿品疏》、《行愿品疏》。唐般若译经,澄观述疏。成于唐贞元十四年(798)五月。

或称,有三卷本<sup>[1](p21)</sup>。日本僧侣入唐求法目录中,并记有一卷本者。《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一卷(沙门澄观述)。”<sup>[2](第55册, p1083)</sup>《东域传灯目录》圆超《华严宗章疏并因明录》,所记同。

澄观(738-839),号“清凉国师”、“华严菩萨”、“华严疏主”。中土华严宗第四祖。依宝林寺霈禅师出家,从润州栖霞寺醴律师、本州县一律师等学律,复至他处学《三论》《大乘起信论》《涅槃经》等。故而其思想兼具华严、律宗、禅宗南北派等的因素。贞元十二年(796)应召入长安,与闍宾三藏般若共译出四十卷本《华严经》,得赐紫袍和“教授和尚”称号。再奉诏在终南山草堂寺制新经之疏十卷,即《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卒后,葬于终南山石室,时相国裴休为撰碑文<sup>①</sup>。

收录于《普慧藏》(第八函第三册)、《续藏经》(第壹辑第壹编第柒套第三至四册)。

是种文献,于卷一至九之末有云:“寿昌元年乙亥岁高丽国大兴王寺奉宣雕造。”<sup>[3](第5册, p64)</sup>寿昌为辽道宗年号。寿昌元年,即公元1095年。是澄观此种著述,尝于公元十一世纪末在高丽国雕版印刷。而卷十之末曰:

此疏十卷之内始五卷,不虑自榭尾奉感得之,为具一部。末五卷,借诸人之笔功,奉终全部。为如意轮院常住所安置也。今年御堂新造之刻,并造佛之务,励书写之。志冀佛教传持而学林枝茂,佛阁不朽而香华不怠。爰(光经)苟依所望难点止书外题,虽恐恶翰,只仰结缘而已。

应永年九月十六日

金刚佛子澄贤(夏菑十生年十六)

一本奥记云:

右正元《华严疏》二十卷,大藏阙亡,有年所矣。绍兴己巳,圆证大师义和得之于梁公御药。鼎来吴江例囊,并劝缘镂板。才辨十二卷,先公知府良中,因过师谈《华严》,得《疏》读之,不能去手。欣然嘱师足其八卷。又得纲要,且欲手书。未几倾背,俱不及成。溥等痛心泣血,追述先志,亟命刊印。式遇外除,饭僧遍施;阐扬佛旨,普益后人。福利所皈,毕助超往。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孤哀子溥澹灌溉泣血书<sup>[3](第5册, p198)</sup>

此种文献是对唐代般若所译四十卷本《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之疏解。分为教起因缘门、教门权实门、所诠义理门、辩定所宗门、修证浅深门、彰教体性门、部类品会门、流传感通门、释经名题门和随文解释门共十门。与同为澄观撰《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六十卷本之“法界品”部分所不同的是:对八十卷本《华严经》六十卷本《华严经》皆缺失,而四十卷本《华严经》所独有之普贤十愿,作了详细的注释。特别是提出了“极乐不离华藏,弥陀即本师”之观点,与净土往生说有一定差别<sup>②</sup>。

### 2 其他注疏

另外,澄观又另撰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别行疏》(又称《普贤行愿品别行疏》《别行疏》)。亦是探讨四十卷本《华严经》之奥义。宗密(780-841)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别行疏科文》一卷、《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或称《华严经行愿品疏钞》、《行愿品别行疏钞》、《行愿品随疏义记》、《行愿疏义记》)六卷(后世有十卷本)。此外,尚有本如述、门人处咸续解《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义疏》二卷,佚撰人《普贤菩萨行法经义疏科》一卷。

## 二、普贤类文物(普贤变)

以画像和雕塑来表现《妙法莲华经》等佛典中的普贤形象,即为普贤变。历史上或现存的普贤变,主要包括两类:单尊普贤塑像或画像,与其他佛菩萨相呼应之普贤像。普贤变中的普贤,无论坐姿、与之相配的佛菩萨甚至性别,在不同历史时期皆有差异,呈现出浓郁的中土特色。

① 参考《宋高僧传》卷五、《释门正统》卷八、《佛祖统纪》卷二十九等。

② 《华严经行愿品疏》卷十:“不生华藏而生极乐,略有四意。一有缘故。二欲使众生归凭情一故。三不离华藏故。四即本师故。”《卍新纂续藏经》,第5册,第198页a栏。

敦煌发现的普贤变至少达 125 铺,在菩萨中仅次文殊变 131 铺<sup>①</sup>,可见其在中古时期的重要性。这些普贤变一般在洞窟中相对独立,即占据洞窟的某一部分(或佛龛帐门的南北两侧,或东壁窟门南北,或在窟顶南北,或在窟外前室南北),以普贤为表现中心,周围再铺陈以其他陪衬性的侍从;其侍从随着时代的推移,日趋繁杂,到五代时期可多达数十人,包括了梵天、天王、天龙八部、力士、菩萨等,外加幢幡、彩云、鲜花、舞乐之类。

部分普贤变阐释的是《法华经》“如来灭后,其能书持、读诵、供养、为他人说者,如来则为以衣覆之,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是人有大信力及志愿力、诸善根力,当知是人如来共宿,则为如来手摩其头”之义。姚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七《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描述了普贤与诸大菩萨从东方来到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听闻释迦牟尼说法,并誓愿护持《法华经》在后世的流传。而敦煌石窟中的一部分普贤形像,正表现了普贤从东方前往途中的情景。如莫高窟第九、十二、三六、一五九、一七二诸窟,以及榆林窟第三、二五窟。榆林窟第二五窟之普贤变,位于西壁南侧。为吐蕃时代的作品。纵 242 厘米,横 200 厘米。画面上,普贤结跏趺,安然跌坐于严饰之大白象之上,手结无畏印、与愿印;前有一个黑皮肤、矮小之昆仑奴,手摇鞭子,引导象引;普贤周围,有三尊菩萨;此三尊菩萨及白象,皆足踏莲花。整个队伍由西向东而行。队伍之前,有一身材较昆仑奴更小的童子,捧花跪迎。

其次,描述《华严经》所讲述之普贤形象。佛于成道后之第二七日,于菩提树下为文殊、普贤等上位菩萨宣说《华严经》。普贤菩萨在是经中的地位颇高,与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共称“华严三圣”。“华严三圣”表现在佛教造像或绘画中,就是常见的“一佛二菩萨”的格局:中间为理智完备的释迦牟尼佛,右侧为乘坐六牙白象、主理门的普贤,左侧为骑坐青狮、主智门的文殊菩萨。

敦煌地区现存表现《华严经》的洞窟有:第六、九、一二、二五、四四、四五、五三、五五、七六、八五、九八、一〇八、一二七、一三八、一四四、一四六、一五六、一五九、一九六、二三一、二三二、二三七、二六一、四三一、四四九、四五四、四七一、四七二,计 28 窟。一般依据的是实叉难陀所译八十卷《华严经》而绘制,多表现七处九会。

这些窟中,普贤与文殊相对,画在佛龛帐门之两侧。如第一五九、二三一、二三七等窟。莫高窟第一五九窟,开凿于唐长庆四年(824)左右,时敦煌地区正处于吐蕃统治时期。窟内主龛内乃释迦牟尼佛,龛外之帐门两侧,分别绘有以文殊、普贤为代表的两组像。前人或定名为“文殊变”、“普贤变”,亦有称作“文殊、普贤赴会图”者<sup>[4]</sup>。普贤位于东壁帐门,骑象而行于云端,其衣著华丽,一手托华,结跏趺坐在白象之上;前有二昆仑奴牵象或头顶香炉,四面围以天龙八部、其他菩萨、帝释天等<sup>②</sup>。P. 4638《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土公修功德记》,乃今莫高窟第二三一窟之建窟史。据之可知,窟内塑有以释迦牟尼为主的七躯像;帐门两侧,画文殊、普贤;南壁,画《法华》、《天请问》、《报恩》等经变各一铺;北壁画《华严》、《弥勒》、《维摩诘》等经变各一铺<sup>[5] (p42)</sup>。该窟创于唐开成四年(839),所画普贤当属“华严三圣”之一。

P. 4638 另有《翟家碑》,亦述及今敦煌莫高窟第八五窟之营建过程。是窟创建于唐咸通八年(867)。窟内塑阿弥陀佛一铺,北壁画《药师》、《天请问经》之变;南壁画《阿弥陀经》及《弥勒》之变;西壁龛外两侧,分别画文殊、普贤及其侍从;东壁门两侧,画不空胃索、如意轮<sup>[5] (p43)</sup>。这里的普贤,亦当源于《华严经》。

也有部分普贤变所据经论不明。如 S. 6203《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记录了莫高窟第一四八窟建成之由来,碑文云:

千金贸工,百堵兴役,奋锤聒壑,揭石聒山,素涅槩像一铺,如意轮菩萨、不空胃索菩萨各一铺,画报恩、天请问、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东方药师、西方净土、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弥勒上生下生、如意轮、不空胃索等变各一铺,贤劫千佛一躯。

碑末有纪年曰:“大历十一年龙集辰辰□□□有十五日辛未建。”<sup>[5] (p941-950)</sup>则碑立于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该窟之普贤像乃素(通“塑”)造。由于与文殊、药师、如意轮菩萨等混合,难于知晓所依据之经论。然提到“不空胃索菩萨”(不空胃索观音)、“如意轮菩萨”(如意轮观音)等,当是密教神灵无疑。或许,依唐实叉难陀(652-710)所译《观世音菩萨秘密藏如意轮陀罗尼神咒经》而塑造?

### 三、中土普贤经

中土新造的普贤经为《普贤菩萨说证明经》,一卷。是经有“佛说普贤菩萨证明经”、“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普贤菩萨证明经”、“证明经”、“普贤菩萨说咒经”等别名,仅存于敦煌遗书之中。现已辨识出的《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卷子,包

①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第239页右栏至241页右栏。另参考蓝吉富《净土变相图》,载氏著《听雨僧庐佛学杂集》,“中国佛教学术论丛”第2种,台北:现代禅,2003年版,第226-242页。

② 《敦煌学大辞典》史苇湘撰“第159窟文殊变”条,第133页左栏。

括 S 1552 P. 2136, 北阳 21, 北暑 060等, 计二十号左右<sup>[6]</sup>, 其中最为完整、书法最数精美者, 乃浙敦〇二六号<sup>[7]</sup>。该卷子  
在敦煌出土之后, 一度流入甘肃省民政厅厅长之手, 1937年再转赠于董聿茂, 后藏于浙江博物馆; 原藏品号“二三五六”,  
收入《浙藏敦煌文献》<sup>[8]</sup>时方统一编号为“浙敦〇二六”。唐代写本, 麻纸, 染黄。黄绢引首, 并未装裱。由 21张抄经纸  
粘接而成; 纸高 27厘米, 总长 896.1厘米。纸面上有铅栏线, 框高 22.2厘米, 栏宽 1.5至 1.8厘米不等; 计 522行, 每行  
16字至 18字<sup>[7]</sup>。

隋法经《众经目录》<sup>[2]</sup>(第 55册, p126)、唐道宣《大唐内典录》<sup>[2]</sup>(第 55册, p334-335)、唐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sup>[2]</sup>(第 5册, p472 p474)  
等, 著录为伪经, 故而被中土历代大藏经所摒弃, 目前仅见于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85卷“疑似部”。因为在印度文  
献中并无踪迹, 故而《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应为纯粹的中土所撰普贤文献。

上举《众经目录》标为“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一卷”, 《大唐内典录》称作“普贤菩萨说证明经”,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  
则呼曰“普贤菩萨说证明经一卷”。这应当是隋唐时期的通行称呼。而后代却或将之误识为《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  
天经》<sup>①</sup>, 或定名为《普贤菩萨说咒经》<sup>②</sup>, 甚至判为《黄仕强传》、《普贤菩萨说证明经》两种文献, 只不过是合抄而已<sup>[7]</sup>。  
究竟哪一种题名准确呢?

实际上, 隋代以来就有的《普贤菩萨说证明经》是最恰当的定名。首先, 这不仅因为它是历史上的惯称, 而且因为只  
有它符合实际。现存的卷子, 卷首为《黄仕强传》, 次为《普贤菩萨说证明经》、《佛说证香火本因经第二》, 最后殿以《普贤  
菩萨说证明经》之题名, 表明了“普贤菩萨说证明经”乃全卷的总名, 因为唐及以前之著述, 多是小题在前、大题在后的格  
局。其次, 卷子第一部分内容《黄仕强传》, 不过为一灵验传, 主要宣扬了《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具有治疗痼疾、延长寿命  
之神奇功效, 目的不过是为《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张目而已, 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献。其三, 第二部分《普贤菩萨说证明  
经》后面的《佛说证香火本因经第二》, 亦非能离《普贤菩萨说证明经》而独立。标为“佛说证香火本因经第二”者, 正表明  
“佛说证香火本因经”与前之“普贤菩萨说证明经”, 本乃一体也。更何况, 敦煌遗书中另有《证明经疏》, 所注内容却为  
《佛说证香火本因经》, 可见当时并未将《普贤菩萨说证明经》与《佛说证香火本因经》区别看待。更何况《普贤菩萨说证  
明经》在佛教目录中有所著录, 而《佛说证香火本因经》则从未见于任何经录呢。

总之, 《普贤菩萨说证明经》以一名而实际囊括了 3种文献: 经前为《黄仕强传》, 经文本身又包括《普贤菩萨说证明  
经》、《佛说证香火本因经》。

《普贤菩萨说证明经》的三部分皆为中土人士所撰。叙述中土人事迹的《黄仕强传》不庸论矣, 第二、三部分托名佛  
说, 属于典型的中土佛经, 即中土人士所造作、标明为“经”的佛教文献。

第一种小经《普贤菩萨说证明经》所述, 乃“一时佛在灵鹫山祇水边说此法”, 云一切众生倘作五种功德, 可见弥勒  
佛, 这五种功德为: “剃除须发, 出家学道, 而披法服, 隐居山林, 坐禅学道, 头陀苦行”; “远离恩爱, 舍家弃俗……为人善  
说, 善行教化, 为说十善……”; “造浮图、塔庙、讲堂、精舍、经书、形像, 莫同大小、金银素鍍, 随像大小, 速得成就无上发愿  
者”; “峪半治道, 广作义井, 河次造浮桥, 拯济穷者”; “修持五戒, 奉行十善, 一月六斋, 年三长斋, 为人演说, 度他自度、人  
我兼度, 如是毛发之心者, 菩提无上愿”。复次, 普贤又说“心中忆念普贤菩萨, 读诵此经典者”, 依仗“普贤菩萨威神之  
力”, 能够免除世间种种苦难; “三称南无佛复称九佛名”、“称七佛名字”、诵“往昔过去七十七亿诸佛所说陀罗尼神咒”、  
“复称四天下王名字”等, 皆可受“营护”。世尊再说, 有“出家沙门剃除须发, 假染法服, 不持具相, 不离恩爱, 背法堕俗”  
等十种人, 并不得见弥勒。

第二种小经《佛说证香火本因经第二》谓“香火之本七佛所说”: 佛说“阎浮履地, 振旦国中, 神州东西, 却有南北”,  
此土之人本“不识正法, 不识如来, 不解正法, 不识好人”, “若受持、若读诵、若书写, 若受持、若读诵、护慎香火”, “尔时空  
王如来并告普贤菩萨, 将八万亿童子, 四时上下护念法子”。其次, 弥勒答尊者“香火从何来, 此法从何起, 根由在何处”、  
“度脱何种人”之问。复说释迦文佛出生、修道、造化城等。再称赞“二圣并治, 并在神州”, 当是为武则天作宣传(详下  
文)。普贤再谓佛, “世尊出世时, 我遣力士罗刹王, 平除罪恶人”, 以及其他种种瑞像。最后, 佛告阿难, “我遣汝行此  
法”, 劝人“受持此经, 读诵百遍”。

《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和《佛说证香火本因经第二》中, 皆糅进了本土因素, 民间信仰色彩浓厚。

#### 四、普贤类灵验记

信奉普贤菩萨而获得灵验的故事, 在印度即广泛存在。如《大智度论》卷九载:

① 北 0317(寒 091)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第 19页, 右栏;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 第 386页左栏。

② 北 7663(暑 060)、7664(来 064)、散 1221号。

复次诸佛大菩萨,有时众生恐惧急难,一心念,或时来度之。如大月氏西佛肉髻住处国,一佛图中有人癩风病,来至遍吉菩萨像边,一心自归,念遍吉菩萨功德,愿除此病。是时遍吉菩萨像,即以右手宝磔光明,摩其身,病即除愈。复一国中有一阿兰若比丘,大读摩诃衍,其国王常布发,令蹈而上过。有一比丘语王言:“此人摩诃罗不多读经,何以大供养如是?”王言:“我一日夜半欲见此比丘,即往到其住处。见此比丘在窟中读《法华经》,见一金色光明人骑白象、合手供养,我转近便灭。我问:‘大德以我来故,金色光明人灭?’比丘言:‘此即遍吉菩萨。遍吉菩萨自言:‘若有人诵读《法华经》者,我当乘白象来教导之。’我诵《法华经》故,遍吉自来。’”(遍吉,《法华经》名为普贤)<sup>[2]</sup>(第 25 册, p126-127)

所谓“遍吉菩萨”,即普贤菩萨之别号。归皈普贤菩萨能够消除癩风病,颇同于敦煌写本《普贤菩萨说证明经》中的《黄仕强传》。而称比丘读《法华经》而普贤菩萨便来教导之者,正乃是经《普贤菩萨劝发品》所讲的普贤菩萨所行七种胜事中的“现瑞相”、“通经力”和“护法”也。

中土有关普贤菩萨的灵验传,最为集中的是:唐释慧祥撰《弘赞法华传》十卷、唐僧详撰《法华传记》十卷、高丽了圆(了因)撰《法华灵验传》二卷、南宋释宗晓《法华经显应录》、周克复纂《法华经持验记》、明释袞宏辑录《华严经感应略记》、周克复纂《华严经持验记》。

其他零星的普贤类灵验记,除了敦煌写本《普贤菩萨说证明经》的第一部分《黄仕强传》之外,主要散见于僧传、笔记等之中。如《宋高僧传》卷二四《唐兖州泰岳大行传》:

释大行,齐州人也。后入泰山,结草为衣,采木而食。行法华三昧,感普贤现身。行自叹曰:“命且无常,必归磨灭。未知来世,何处受生?”遂入藏内,信手探经,乃获西方圣教。遂专心思念阿弥陀佛,三七日间,于半夜时,忽睹瑠璃地,心眼洞明,见十方佛,犹如明鉴中像。后时诏行入内宫,寝于御殿,敕赐号“常精进菩萨”,受“开国公”。乃示微疾,右肋而终。葬后开棺,见仪貌如生,异香芬郁焉。<sup>[2]</sup>(第 50 册, p865)

大行行法华三昧而感普贤现身,自是基于《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的普贤行也。

## 五、其他普贤文献

主要包括中土僧人撰述的其他非注疏类文献、碑文和寺院志等。

### 1. 智颢《普贤菩萨发愿文》一卷

现存于《续藏经》第壹辑第贰编正编第肆套第壹册。乃根据普贤十愿(说详第二章第二节“大乘普贤菩萨信仰”),敷衍而成。全文如下:

稽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愿当证知某甲:诸佛所有一切波罗蜜行,我今然当如彼修学,唯愿诸佛如来慈悲哀念,我愿于菩提心得大固力,于不可思议诸佛法中得深信力,于多闻中得不忘力,于往来生死中得无疲倦力,于诸众生中得坚大悲力,于布施中得坚舍力,于持戒中得不坏力,于忍辱中得坚受力,魔不能坏得智慧力,于深法中得信乐力。

一者,愿我于一切生处、一切法中,常得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尽未来际无有休息。

二者,愿我受持如来甚深法海,即自明解,不由佗悟,尽未来际无有休息。

三者,诸佛坐道场处,愿我于中作摄法上首,请转法轮度脱众生,尽未来际无有休息。

四者,愿我修行一切诸菩萨无边广大愿,尽未来际无有休息。

五者,愿我教化一切众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悉皆令入无余涅槃,尽未来际无有休息。

六者,愿我生诸佛刹如对目前,尽未来际无有休息。

七者,愿我严净诸佛如来甚深刹海,尽未来际无有休息。

八者,愿我与一切诸菩萨同行,集诸善根,尽未来际无有休息。

九者,愿我所有身口意业,众生见闻皆获利益,如药树王无空过者,尽未来际无有休息。

十者,愿我于一切微尘道中成等正觉,转大法轮,度脱众生,尽未来际无有休息。

佛子若能发此十大愿者,百万阿僧祇愿门皆悉见发。愿以此广大誓愿、种种善根,回向一切众生,愿皆永离三恶道苦,具足普贤菩萨行愿。我又以此善根回向无上菩提,不求世间二乘果报。我又以此善根回向真如法界海,真如无灭,无漏无为,不可破坏。愿我善根亦复如是。如三世诸佛回向,我亦如是回向。回向已,归命礼三宝。<sup>[3]</sup>(第 55 册, p689-690)

很显然,本文属于佛教法事文体,在修行的某一时段,加以宣读。南朝陈代慧思有《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而敦煌遗书中亦有诸多愿文,用于各种场合。

### 2 巴竹·吉美却旺《普贤上师言教》

藏语曰:ku? - bzang- bla- mavi- zhal- lung 全称《大圆满法悟境精义加行导引普贤上师言教》。藏传佛教宁玛派巴竹·吉美却旺(1808-1887)著。包括共同外加行、不共内加行、修行根本次第、往生次第,共四篇。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9年有重印本。

### 3. 碑文及寺院志

历史上一批碑文,记录了当时塑造普贤菩萨像等种种反映普贤信仰的情况,很可宝视。如唐韦皋(745-805)《再修大慈寺普贤菩萨记》,撰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成都大慈寺普贤菩萨初修之碑,已然不存。据碑文言:“昔大历初,有高行僧,不知何许人,曰:‘斯像后十年而废,二十年而复兴。’……皋因降诞庆辰,肃群僚,戒武旅,上崇景福,斋于斯寺。睹象王雄杰,天服慈囑,礼足谛视,悦如有神。而废敞渊漏,殆无人迹,将何以招诱沉沦,发挥诚敬?遂南迁百余步,度宏规,开正殿。……观其左压华阳之胜,中据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址,玉垒秀其西偏,足以彰会昌之福地,弘一方之善诱。安得不大其栋宇,规正神居哉?”<sup>[9]</sup>(卷四五三)显然,当时大慈寺所奉普贤像之处,破败不堪,故而在其南面百余步之地,重新建造正殿,以奉放焉。再如,明傅光宅《峨眉山普贤金殿记》(见《嘉庆四川通志》卷四一)等,亦本刻石也。

至于寺院志,最重要是当为《峨眉山志》。清康熙十一年(1672)蒋超据并研胡阁《译峨籁》,而编成《峨眉山志》八卷<sup>①</sup>。民国十九年(1930),印光大师加以重修,厘为八卷,分为十一门:星野图说、菩萨圣迹、金山形胜、寺庵胜概、感应灵异、历代高僧、王臣外护、仙隐流寓、古今艺文、动植物产、蒋编志余。《峨眉山志》记录了峨眉山普贤信仰的历史、胜迹、高僧等,是研究中土普贤菩萨信仰不可或缺的史料。

### 参考文献:

- [1] 童 玮. 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M].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 [2] [日]河村孝照,等,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 大正新修大藏经[Z]. 东京:大藏经刊行会, 1924-1935
- [3] [日]卍新纂续藏经[Z]. 东京:株氏会社国书刊行会, 1980-1989
- [4] 李永宁. 敦煌莫高窟第159窟文殊、普贤赴会图[J]. 敦煌研究, 1993(4).
- [5] 季羨林,等. 敦煌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 [6] 张子开. 敦煌普贤信仰考论[J]. 山东大学学报, 2006(4).
- [7] 蒋 冰,鲁大东. 历代小楷精选[M]. 杭州:西泠印社, 2004
- [8] 浙藏敦煌文献[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 [9] 董 诰,等. 全唐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张立荣)

<sup>①</sup> [民国]许止净辑:《峨眉山志》,苏州弘化社排印本;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7年10月第1版。另,收入《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